

杨 晖 总译审
王大伟

Раздумья о России

俄罗斯思考

[俄]德·谢·利哈乔夫 著

上
卷



军事谊文出版社

杨 晖 王大伟 总译审

俄罗斯思考

〔俄〕德·谢·利哈乔夫

(上卷)

军事谊文出版社

(京)新登字: 121 号

书 名: 俄罗斯思考

著 者: [俄] 德·谢·利哈乔夫 总译审: 杨晖 王大伟

出版
发行者: 军事谊文出版社 (北京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一号)

(邮编 100011)

印刷者: 谊文印刷装订厂

开 本: 850×1168 1/32

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25

字 数: 600 千字

印 数: 1—1000

书 号: 80150-065 (军内发行)

定 价: 50.00 元 (上、下卷)

影响普京治国理念的俄罗斯哲人——利哈乔夫 及其名著《俄罗斯思考》

(代 序)

《俄罗斯思考》是俄著名历史学家、文艺理论泰斗——利哈乔夫院士生前的最后一部著作，出版于1999年。该书出版后在俄政界、知识界引起巨大反响，俄舆论界甚至有“不读《俄罗斯思考》，就不能真正了解俄罗斯”之说。2001年3月7日，普京总统在接受俄媒体采访时宣称，他十分推崇《俄罗斯思考》一书，并称其是“对俄罗斯历史和文化进行深刻理性思考的书，很值得一读”。俄国内政治学者及接近普京的部分人士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利哈乔夫的思想及其《俄罗斯思考》一书对普京有很大影响，为其“强国主义”的治国理念提供了历史和文化基础。

—

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利哈乔夫是俄著名文艺学家、版本学家、文化史学家，俄罗斯联邦科学院院士，1906年11月15日生于圣彼得堡，1999年9月30日辞世，享年93岁。利哈乔夫的父亲是一名普通的电气工程师，母亲是虔诚的东正教旧礼仪派教徒，对利哈乔夫宗教观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1917年

DW711/34/02

利哈乔夫 11 岁时，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从中学时代起，利哈乔夫就开始参加当时颇为流行的各种非官方社团，后来进入列宁格勒大学社会科学系民族学和语言专业学习。在毕业前一年，利哈乔夫和 7 个同学组织了一个学术小组，大家轮流在组内作学术性报告，他曾作过题为《论旧正字法的优点》的报告。后这一小组被定性为反政府组织，利哈乔夫也在 1928 年考完毕业考试最后一门课程后被捕。他在狱中被关押 9 个月后未经审判即被流放索洛韦茨基群岛 5 年，在那里挖过运河、修过铁路。1932 年因表现良好被提前释放，返回故乡列宁格勒。此后，利哈乔夫曾在苏联科学院出版社当过校对和编辑。在 1938 年苏联大清洗的高潮时期，他进入苏联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工作，从此开始了长达 61 年的学术生涯。

利哈乔夫以研究古俄罗斯文学和 10 - 17 世纪俄罗斯文化史而著称，其学术研究涉足领域极广、著述颇丰，共出版了 50 多部著作，成名作是 1950 年问世的《〈伊戈尔远征记〉（历史文学概述）》。对这样一位著作等身的大学者，苏联及俄罗斯政府都给予其很高荣誉：1953 年利哈乔夫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70 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91 年后为俄罗斯联邦科学院院士；1952 年和 1969 年两度获得苏联国家奖金，1986 年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和劳动红旗勋章，1993 年获得俄联邦国家奖金。利哈乔夫在国际学术界亦享有较高知名度，1984 年第 2877 号小行星即以他的名字命名。

作为研究古代俄罗斯文化的学者，利哈乔夫似乎并不甘于埋首于故纸堆中，还积极从事社会活动。在 20 世纪 70 - 80 年代，利哈乔夫是和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作家索尔仁尼琴齐名的苏联三大“持不同政见者”。1986 - 1991 年任苏联文化基金会理事会主

席，1991—1994年改任俄罗斯国际文化基金会理事会主席，在国际文化交流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苏联解体后，利哈乔夫的声望“如日中天”，被部分媒体尊为“俄罗斯伟大的智者”、“俄罗斯永远为之骄傲的真正的公民”，其著作及言论成为“至理名言”，推崇利哈乔夫一度成为俄罗斯政治界和知识界的时尚。但俄亦有媒体认为，“利哈乔夫晚年被人变成了圣像。政治家们纷纷引用他的观点，试图把他的威信变成自家的畅销货。”

利哈乔夫去世后，俄政府在圣彼得堡为之举行了极其隆重的葬礼，时任俄政府总理的普京从莫斯科专程前往出席。参加葬礼的还有俄国家杜马主席谢列兹尼奥夫、政府副总理马特维延科、莫斯科市市长卢日科夫、圣彼得堡市市长雅科夫列夫等各界代表一万余人。当时的总统叶利钦、东正教全俄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马约尔等纷纷发去唁电。叶利钦在唁电中称利是“一位举世闻名的学者、杰出的文化活动家、十分值得尊敬的人”，“他体现了俄罗斯知识分子最优秀的品格”。普京在悼词中称利的逝世是“俄罗斯和全体俄罗斯人的巨大损失”，为此而感到“十分悲痛”。俄有媒体甚至宣称，利哈乔夫的逝世“结束了一个时代”。

二

利哈乔夫的巨著《俄罗斯思考》是其晚年多篇笔记和学术研究成果的辑成。该书在作者去世前8天才交出版社发排，可谓利哈乔夫的“绝唱”。

《俄罗斯思考》全书共60余万字，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收入论文19篇；第二部分是札记和草稿，共12篇；第三部分作为附录，收入利哈乔夫的讲话、谈话记录及其他材料共7篇。

卷首刊有《作者的话》，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开头各有一大篇未加标题的引子。通过这两个篇幅相当长的引子和篇幅很短的《作者的话》，利哈乔夫把写作意图和想强调的主要内容都作了充分交代。

利哈乔夫明确指出，苏联解体后，俄国内有人在赞颂俄罗斯，有人在诋毁俄罗斯，而更多的人则对俄历史和文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像俄罗斯那样被人如此褒贬不一”。有许多论者对历史知之甚少，却对现状大加抨击，对未来随意预测。“不能正确了解历史，就无法走向未来。而要真正了解俄罗斯的历史，首先应研究其历史和文化的‘特点’”。由此可见，利哈乔夫撰写《俄罗斯思考》的目的在于反思俄罗斯历史，搞清楚俄罗斯的根本特点，判明“造成目前悲剧性局势的真正原因潜藏在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哪些特点里；而哪些特点又给人以希望，使人能对俄罗斯的未来保持乐观，对俄罗斯的潜力充满信心”。正是这一点对普京乃至每个俄罗斯读者都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普京当然想听听这位有着漫长人生阅历又学贯古今的耄耋老人的看法。

该书内容涉及面极广：既泛论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民族性格，又专论俄罗斯历史上某一重要时期（如罗斯受洗、彼得一世的改革等）；既讨论艺术起源、艺术风格，又分析俄罗斯文学史上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既详细介绍俄罗斯各个时期的建筑和绘画（尤其是教堂建筑和圣像画），又研究俄罗斯语言特色；既评论基辅、彼得堡、莫斯科等名城历史地位及城市建设，又阐述东正教圣地索洛韦茨基兴衰经过。书中还用较多的篇幅讨论了名胜古迹及历史文物的保护和修复问题。可以说，文集几乎囊括了整部俄罗斯历史：从千余年前罗斯立国、皈依基督

教、蒙古入侵、彼得一世改革一直谈到 20 世纪 90 年代苏联解体后的一些事件，大到俄罗斯的历史经验，小到对一句诗、一个俄语词的解释，都娓娓道来、涉笔成趣。

由于作者博学多识，对古罗斯文化和东正教的研究很深，他在谈许多问题时，尤其是在谈东正教教堂建筑和俄罗斯园林的特点时往往不厌其烦地详细描述，诸多细节信手拈来、如数家珍，确实令人眼界大开。他在探讨俄语词的概念时，常能出人意料地指出一些词词义的异同，很能激发读者的思考，也使文集有了更多的可读性和趣味性。

利哈乔夫在本书中针对俄现状亦不时提出一些具有人文主义色彩的建议：他认为社会必须宽容，要相互理解，否则暴力将得到进一步蔓延；他认为俄罗斯人民要有为自己决定政策、为自己负责的权利和力量，而不要把一切问题都往前人身上推，往外国人身上推；他指出不能独尊俄语，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应被遗忘，各种语言的多样性和特性都是人类社会的一笔巨大的财富；他还建议修建莫斯科至圣彼得堡条状城市带，沿莫斯科至圣彼得堡的交通线，由两端向中间发展，建成连成一体的条状超大城市等。

三

书中一些观点在俄政界、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也引起了普京总统的重视。比如：

关于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极端性。作者通过对俄罗斯历史特别是 20 世纪后期诸多事件的反思，认为俄罗斯民族性格的最大弱点是爱走极端。“俄罗斯人居住的辽阔地域决定了粗犷、豪

爽是俄罗斯民族气质的特点，而这一特点决定了俄罗斯人的极端性格。俄罗斯人经常摇摆于善与恶之间，往往会从一端突然而迅速地走向另一端。俄罗斯民族的极端性主要表现为：既善良，又残忍；既彬彬有礼，又粗鲁野蛮；既热爱自由，又专横跋扈；既笃信宗教，又不敬上帝；既大公无私，又爱财如命；既讲求实用主义，又不善处理问题；既妄自菲薄，又搞沙文主义；既对国家绝对忠顺，又多有反抗斗争之举。这种爱走极端的民族性格在俄历代君王和苏联领导人身上均有所体现：他们愿意用最珍贵的东西去冒险，在实施自己的意图和想法时充满狂热，为了前进而不惜狠狠打击并摧毁旧的一切。这也是俄罗斯历史上发生许多偶然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俄罗斯人是难以预料的人，俄罗斯历史是难以预料的历史。

受利哈乔夫的影响，普京对俄罗斯民族好走极端的弱点有着清醒的认识，出任总统后谨言慎行，绝不感情用事。俄媒体称普京“克制力极强，鲜有过激举动；左右逢源，深谙‘柔道’之术”。在内政方面，普京对各派政治力量基本上兼容并蓄，使派系纷争不仅没有对其地位构成威胁，反而使其在调整利益矛盾时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在外交方面，普京突出“全方位”色彩，强调平衡外交、东西兼顾，注重韬光养晦，既坚定地与西方国家改善关系，又不忘第三世界国家的传统盟友；既把俄美关系看作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又大力发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关于俄罗斯国家属性与定位。作者指出，在研究俄罗斯文化时，首先遇到的是国家属性问题。苏联解体后，欧亚主义一度在俄十分盛行，不少学者认为俄罗斯是欧亚国家，其文化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利哈乔夫坚决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

“决定一个国家属性的不是其地理位置，而是国家起源、文化特征和宗教信仰”。从国家起源来说，罗斯是由来自北欧的瓦兰人始建的；从文化根源上看，俄从来都是属于欧洲文化的国家，而“亚洲游牧民族对定居的罗斯的影响微不足道”；从宗教上看，罗斯信奉的是大多欧洲国家信奉的基督教，罗斯文化是在基督教文化基础上发展的。利哈乔夫否认“欧亚主义”的目的旨在强调俄罗斯的欧洲国家属性，认为“俄罗斯从来不是东方”，而是一个欧洲国家，其文化是欧洲文化。

利哈乔夫的上述观点对普京影响至深。普曾多次表示，“俄罗斯是欧洲文化的组成部分，我无法想象自己的国家被隔离于欧洲和世界文明之外。”今年1月，普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界定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和一个民族的属性时，文明是首要因素。从地理角度看，俄罗斯是一个欧亚国家；但从文明角度看，俄罗斯毫无疑问是一个欧洲国家，因为它具有欧洲文明。”普的这番话几乎是利哈乔夫的翻版。普京强调俄罗斯的欧洲属性，旨在为其“融入欧洲”的外交政策寻找历史基点，试图证明这一政策并非主观臆断、不切实际，而是一种历史回归。

关于对俄罗斯历史的继承与发展。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利哈乔夫在书中多次呼吁，“不应丢弃伟大文化遗产中的任何东西，对历史应持呵护有加的尊重态度，与旧事物保持联系，又不对它顶礼膜拜”；强调“既要认识到自己是历史的继承人，更要认识到对未来承担的责任。作者指出，俄罗斯文化现在已灾难性地衰落，必须要妥善保护民族文化、语言、文学、音乐等历史传统，保护一切文化设施，特别是博物馆、档案馆和图书馆。惟如此俄罗斯才能真正成为世界强国。

苏联解体后，在对待历史问题上，俄各派政治力量态度迥

异，其中不乏象叶利钦那样彻底否定苏联 70 多年历史的人。而普京则采取了利哈乔夫对待历史的态度，认为历史和现实不可分割，“任何人都无法回避历史，毫无意义地否定历史将使整个民族数典忘祖。在过去的 20 世纪里，俄罗斯有四分之三的时间生活在共产主义学说的标志下。我们不应忘记‘大清洗’的 1937 年，但我们也不能只记得 1937 年。看不见甚至否认苏联时期不容置疑的成就是错误的。”正是基于对历史的尊重，普京决定沿用苏联时期的国歌旋律，恢复红旗为俄军军旗，并坚决反对将列宁遗体迁出列宁墓异地安葬。

关于东斯拉夫民族的团结与统一。利哈乔夫在书中通过对古罗斯历史的阐述，反复强调俄罗斯的历史是一部呼唤统一、反对分裂的历史。作者充满激情地撰写了《基辅颂》一文，指出基辅是古罗斯的母亲城，也是古罗斯统一的象征。俄罗斯最大的圣地是基辅洞窟修道院。东斯拉夫三个民族（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自古以来就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没有乌克兰就没有俄罗斯，没有乌克兰语言就没有契可夫，反之亦然。共同的命运、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宗教联结起东斯拉夫三大民族的文化，而共同的文化艺术又促进了这三个民族的统一进程。“千百年来他们不仅一路同行，而且齐步前进”。因此，利哈乔夫虽然竭力反对苏共当局，但对苏联解体却痛心疾首。他再三呼吁要珍视东斯拉夫三个民族的同源关系，渴望其再度统一的心情之殷切、言词之恳挚跃然纸上。

在这一问题上利的观点对普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普京执政以来十分珍视前苏国家的友谊与团结，多次强调其对俄罗斯的重要性。他说“前苏联所有共和国与俄都很亲近，同独联体国家的合作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将是绝对优先的方针”；“俄罗

斯与白俄罗斯具有特殊的关系，白俄罗斯是我们最密切的伙伴”；“俄乌两国历史的共同性决定了双方除发展亲密、友好的战略关系外，别无选择。”最近，普京在 2002 年国情咨文中再次将对独联体外交视为其优先方向。但与此同时，普京也多次指出，在珍视东斯拉夫民族共同历史的同时，也必须正视苏联已经解体的现实，“谁不为苏联解体感到痛心，谁就没有良心；谁要想重新恢复苏联，谁就没有头脑”。

关于彼得大帝的激进改革。与俄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不同，利哈乔夫对彼得一世评价并不很高，认为其改革付出了昂贵代价，“他在用尸骨填平的沼泽地上修建起彼得堡”。作者认为，彼得一世的激进改革歪曲了此前 700 年的俄罗斯历史，抛弃了罗斯文化与传统，并导致专制制度的出现和农民受奴役程度的加深。利哈乔夫对彼得一世的看法自成一家，其意在借古鉴今，通过对历史的论述阐明其对改革的成本和代价、对激进改革与渐进改革利弊的看法。“彼得改革本来可以不那么匆忙，稍慢一点可以取得同样的结果”。

普京对彼得一世则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其在接受我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曾表示，“我在以彼得命名的城市出生和就读，对彼得大帝深怀敬意。在任圣彼得堡市市长助理和第一副市长期间，我的办公室只挂彼得大帝的画像”。在改革问题上，普京的态度非常坚定：“如果一个人对所有的事情都满意，那么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白痴。一个健全的人、一个神志正常的人不可能总是对一切都满意。因此，必须进行改革。”但同时，普京某种程度上也接受了利哈乔夫的“改革应循序渐进”的观点，尽量避免改革过激而带来后遗症。他说“革命对俄罗斯已经够多了，现在应该开始稳定的正常生活。俄罗斯在政治和社会经

济动荡、剧变和激进改革中已经精疲力竭。只有幻想家或对国家和人民冷酷无情的政治力量才会呼吁再进行一次革命”。

四

需要指出的是，利哈乔夫受自身阅历和政治立场的局限，书中一些观点有失偏颇。他在抨击历史上的极端和偏见的同时，又散布了新的极端和偏见。为此，中国读者应站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利哈乔夫在谈学术问题时时常流露出其政治好恶。青年时期，利哈乔夫曾因莫须有的“政治罪”而被捕入狱并被流放了5年。这段经历给其世界观的形成打下深深的烙印。书中常常流露出作者对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制度的痛恨和憎恶，言词相当激烈。1989年苏联著名的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院士逝世。利哈乔夫以83岁的高龄在追悼大会上发表了“他保全了我们的荣誉”的悼词，把苏联称为“充斥谎言、恶行和暴力的社会”，称如没有萨氏“俄罗斯人将永远蒙受耻辱”。

利哈乔夫在《俄罗斯思考》一书中开列了一张俄历史上的“不朽者名单”，罗列所谓各界精英一百多人。但在列举国家领导人时，他列出了包括伊凡雷帝在内的许多沙皇的名字，却只字不提改变了20世纪俄罗斯整个历史面貌的列宁；他把国内战争中白卫军将领科尔尼洛夫、高尔察克称为著名军事统帅，对卫国战争中叱咤风云的斯大林、朱可夫则不屑一提；在列举著名作家时，他不提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甚至不提契诃夫，却列入列斯科夫、别雷这样的二流作家。读者在书中能遇到很多类似的例子。由此也可以看出，

偏见比无知离真理确实更远。

《俄罗斯思考》中亦有一些学术上的谬误。如利哈乔夫不同意俄一般辞书对知识分子下的定义，认为“受过高等教育、有学问的人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是内心世界自由的人，他们信仰上不受约束，不为来自政党、国家和经济的压力左右，不屈从于某种意识形态”。他认为甚至连高尔基都不能算是知识分子，因为他曾说过“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作者从欧洲文化的立场出发得出的某些学术观点亦经不起推敲。如他说俄罗斯 1497 年编成第一部律书，要比世界上其他民族同类律书早得多；诺夫哥罗德城的道路 11 世纪就铺上了路面，也要比别国早得多。诸如此类的论断是俄罗斯人习以为常的，有时是出于他们对欧洲文化以外的世界文化知之不多，有时则出于其根深蒂固的大俄罗斯主义。

为使读者全面、深入了解俄罗斯情况，我们在编译中未作删节，仅供内部研究参考。由于时间和水平所限，本书的译校难免有不妥之初，敬请读者指正。

杨 晖 王大伟

二〇〇二年五月于北京

作者的话

我在本书中所说的一切，完全是一己之见，我决不强加于任何人。但是我有权谈论我最总括的印象，即使是主观的印象，因为我一辈子都在研究俄罗斯，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比俄罗斯更珍贵。

有人指责俄罗斯，有人赞颂俄罗斯。一些人认为俄罗斯文化没有独立性，纯属模仿；另一些人以俄罗斯的散文、诗歌、戏剧、音乐、圣像画……而感到骄傲。一些人认为俄罗斯的国家因素过分发达，他们认为俄罗斯人民逆来顺受；另一些人指出俄罗斯人民中存在无政府主义因素，一贯叛逆成性，不服从权力。一些人认为我国历史没有一定的目标；另一些人则看到俄罗斯历史中的“俄罗斯思想”，我们有对自身定位很高的使命感。可是对有特色的过去的一切没有准确的认识，就无法走向未来。

这本书由我近年来的各种笔记和研究成果辑成。有一些札记是对某些文章（现在出版物上这样的文章不少）作者的回答，是在不由自主地与他们争论时的抗辩，因为这些文章中包含着种种有争议的关于俄罗斯及其过去的论断。此类文章的作者通常对本国历史知之甚少，因此对国家的现在的评论是错误的，他们对未来预测的随意性极大。

我的看法有时与我涉猎的范围、我对本国史某些阶段的思考有关。我在本书中并不力求这一切安排得十分妥帖。有人会认为我的札记主观色彩很重。但请大家不要急于就作者的立场作出结论。

我并不鼓吹民族主义，虽然我在谈到生养我的亲爱的俄罗斯时心痛如绞。我无非主张从历史角度对俄罗斯应有一个正常的观点。我以为，读者最终会懂得，这种“正常的观点”的实质是什么？造成目前充满悲剧性局势的真正原因潜藏在俄罗斯性格的哪些特点里？而哪些特点又给人以希望，使人能对俄罗斯的未来持乐观的看法，对俄罗斯尚未被利用的潜力充满信心。

德·谢·利哈乔夫

俄罗斯思考

《俄罗斯思考》是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利哈乔夫院士的最后一本书。本文集收录了作者认为最具现实意义的论文和札记：俄罗斯文化史及其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关于俄罗斯文化的神话，俄罗斯文化的民族特点及其最典型的特性。文集同时还收入关于知识分子及其在保存文化方面的作用和关于历史文物的修复原则的思考。

附录收入德·谢·利哈乔夫为保护文化遗产所作的最精彩的讲话。

本书手稿于1999年9月22日即作者去世前八天付梓。